

中古汉语研究

王云路 方一新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中古汉语研究

王云路 方一新 编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汉语研究/王云路, 方一新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ISBN 7-100-02582-6

I. 中… II. ①王… ②方… III. 汉语-古代-研究 IV.
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6171 号

ZHĀNGGǔ HÀNYÚ YÁNJIŪ

中古汉语研究

王云路 方一新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7-100-02582-6 / H·664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20.00 元

前　　言

所谓“中古汉语”，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说，本书是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语言，以与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的《近代汉语研究》相衔接。因此，本论文集所选的篇目，也基本上框定在这一范围内。

在汉语史的研究对象中，历来把重点集中在先秦一段，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从文献典籍的历史来看，先秦离我们最远，语言的障碍最大。许多先秦文献，如果不加注解，可能根本就读不懂。比较而言，汉魏以降的作品就要好懂一些。但是，在实际阅读汉魏六朝的作品以后可以发现，许多先秦使用的词语，在这一时期又产生了新的意义；许多看似普通易懂的词语实际含义并不普通，容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唐宋以后近代汉语作品中流行的不少新词新义，其源头可以上溯到汉魏六朝。正因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语言处于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阶段，它在汉语史研究中应当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了。

较早措意于汉魏六朝语词的，有历代关于这一时期作品的注释、唐宋以来的考据笔记，还有清代学者所编的《通俗编》、《恒言录》等资料性质的书。清代学者郝懿行撰《晋宋书故》、《证俗文》，是研究水平比较高的专著。但从总体上看，还都属于零打碎敲，算不上系统的研究。真正从汉语史角度对这一时期的语言作研究的，要数现当代的学者。比如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早在三十年代，就撰文对《三国志》中的词语作过考释；著名学者周一良在四十年代，已经对六朝佛典的词语作过研究。建国以来，陆续有不少学者

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从整个汉语史或词汇史角度作研究的，有王力的《汉语史稿》，此书在全面论述汉语发展的历史时，对汉魏六朝时期的不少语言现象及常用词演变作了垦荒式的研究，有导夫先路之功。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写于八十年代，书中对包括汉魏六朝词汇在内的许多词汇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向熹的《简明汉语史》，以丰富的资料、翔实的论证，对汉语的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汉魏六朝这一段的述论很见功力，在同类著作中不愧是后出转精之作。从训诂学角度作研究的，有蒋礼鸿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郭在贻师的《训诂丛稿》、《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等。蒋书虽然是解释敦煌变文词语的，但溯源工作做得较好，常常追溯到汉魏六朝时期；周书看似和语言无关，实际上全书考释六朝词语的内容占了相当的比重，所释切当；郭师的两本书中都有一些论文是专释汉魏六朝词语的，考释的难度较大，结论大抵可信。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近十多年来，学者对中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在逐步加深，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研究更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成果的类型上看，有专以某一类文献语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江蓝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李维琦的《佛经释词》、俞理明的《佛经文献语言》、刘百顺的《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考释》；有以某一专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张万起的《世说新语词典》、吴金华的《三国志校诂》；也有通释这一时期语词或对语法问题作全面研究的，如蔡镜浩的《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王云路、方一新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柳士镇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专著之外，还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国外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果。

从所利用的资料上看,举凡小说、史乘、诗文、佛经、科技书、杂著、金石碑帖、出土文物等等,无不在挖掘、利用之列。

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的训诂考释方法仍然得到沿用,这些方法包括排比用例、利用古训、审核文例、破除假借、方言旁证等;更为可喜的是,已经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尝试使用。比如,有学者利用汉藏语系的对比材料,考释单凭汉语本身难以解决的词语;有学者引进使用国外转换生成语法的句式对比研究方法,来研究汉语的语法现象;也有学者运用梵汉对照的方法,来研究汉译佛典语言。总之,在运用新方法研究汉语史方面,另辟蹊径,进行了可贵的尝试。

虽然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研究得还很不够,存在着明显的薄弱环节,不少问题还有待于解决。就整体来看,词汇、训诂、语音、语法的研究还有不平衡的倾向;对“中古汉语”的起迄分期尚有不同意见,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直接关系到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就研究对象来看,以往的词汇、训诂研究集中在疑难词语的考释上,而常用词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对此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另外,从整体上进行“史”的研究的著述还不多,这方面存在的空白,还有待于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加以填补。

在中古汉语研究蓬勃发展、势头喜人的今天,编选一本大体反映近二十年的中古汉语研究成果和进展的论文集,展示这一领域的研究概貌,不仅有必要,而且也完全可能了。在商务印书馆张万起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编选了这本论文集。选收论文二十四篇,大体按类别排列。从内容上看,由于个人的偏爱,词汇、训诂方面的文章稍多一些,轻重偏倚,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由于我们学殖庸浅,所见有限,加之篇幅的限制,许多优秀的论文未能入选,一

并请同行、读者惠予原谅！

本书的最后，附上 1978 年到 1996 年间的有关中古汉语方面的研究论文目录，以供同行和读者参考。

王云路 方一新

1997 年 5 月于杭州

目 录

- 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 徐 复(1)
从语言角度看《齐民要术》卷前《杂说》非贾氏所作 柳士镇(16)
-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张永言 汪维辉(27)
魏晋六朝汉语词汇双音化倾向三题 骆晓平(52)
《论衡》中联合式复音词的语义构成 程湘清(66)
《世说新语》复音词问题 张万起(79)
《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魏晋时期的新词和新义 殷正林(87)
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 朱庆之(125)
六朝史书与汉语词汇研究 方一新 王云路(143)
- 魏晋南北朝词语考释方法论
——《魏晋南北朝词语汇释》编撰琐议 蔡镜浩(157)
- 魏晋南北朝词语小记 周一良(169)
《生经·舅甥经》词语札记 太田辰夫 江蓝生(178)
六朝俗语词杂释 郭在贻(187)
隋以前佛经释词 李维琦(196)
《三国志》解诂 吴金华(213)
汉魏六朝佛经释词 张联荣(225)
- 徐邈反切声类 蒋希文(244)

周、隋长安方音初探	尉迟治平(255)
中古汉语鱼韵的音值——兼论人称代词“你”的 来源	[日]平山久雄(281)
中古(魏晋南北朝)汉语的特殊疑问形式	[日]太田辰夫(298)
魏晋南北朝时期“了”字的用法	
——“了”字综合研究之一	潘维桂 杨天戈(307)
汉魏六朝佛经所见若干新兴语法成分	董 琏(321)
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	唐钰明(347)
从佛经材料看六朝时代的几个三身称谓词	俞理明(358)
附录	
近二十年来有关中古汉语研究论文目录	(368)

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 一诗的写定年代

徐 夏

前 言

《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作年代，最通行的说法是这样的：“它最初出现在南朝陈代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里，诗前有小序，大意说：这是汉末建安时期的人为焦仲卿夫妇被迫自杀的悲惨事件而写的一首诗。徐陵又把这首诗列在繁钦和曹丕两人的诗的中间，所以向来大都把它当作汉末的作品。但是这首诗里有些词汇是三国以后才通行的，有些诗句又像六朝人的口吻，大约在它被徐陵编选以前的三百多年间，被人们传诵、传写，不免随时修改。载在《玉台新咏》里的这首诗，可能不完全是本来面目了。^①”我们看了上面的话，一方面承认人民口头创作的特点之一，是要经过许多年代许多人的修改和润饰，才成为传世的定本；但在另一方面还得承认《孔雀东南飞》是一首长达 1785 字的叙事诗，^②它一直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如果在陈代徐陵编选以前的三百多年间还没有一个写定的脚本，也就是说，还没有用文字的记载把它固定下来，这对伟大诗篇的广泛流传来说，也是不可想像的事。因此，我们必得进一步来推测它的写定年代，而不是笼统地人云亦云，这就显得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了。

我们知道语言中的词汇，它是最现实的，也是变化最敏感的东

西，只要时代一有了变化，它就跟着产生了新的词语。所以要推测一篇作品的写定年代，只有从词汇中去寻求，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有人单看几个韵部和语法的变化，那是要慢得多的，有时整整几百年的时间，它们还是很少变化，但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们就永远不变化。甚至一个地名，一种制度，都可以用来作为推测年代的方法。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辅助的方法而已，当有了语言上某种强有力的证据时，它们倒是可以做个次要证据的。

现在假定从语言上来推测一篇作品的写定年代，要具备下面两个条件：(1)在这篇作品中要有一些特殊的词，即是和时代有关系的词，它们在同时代别人的书中，有的见过几次，有的刚好见过一次，这种关系，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再在这个时代中，有好些人都用过这样的词语，而且用得相当广泛，这种词，它已盖上了时代的烙印，更应该引起注意；(2)在这篇作品中要有较多的语言事实，一个一个都可以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它们的年代，早一些时，可能它们还没有出现，迟一些时，它们又已经消失了，此种关系，要审慎地处理。《孔雀东南飞》倒是符合上面所举的两个条件的，它确有一些特殊的词，可供我们来探索，也有较多的语言事实，提供了汉语史上的确凿证据。我们进行推测的结果，这篇不朽的诗篇，是写定在东晋时代的，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是很少例外。这里要交代一点，就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我们把它的某些材料放在东晋来处理，为的是它主要反映了晋代一些人物的生活面貌，如实地记载了当时的语言，同时还有好些词语在这以前还见于晋代的其他人的著作里，所以一同把它列入书中了。

一、解释“兰家女”这个特殊词语

这里先提出“兰家女”的解释问题，它是一个在诗中最为特殊的词语，通过它可以找到一些时代的线索。我们看这一段诗：“媒

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这里的标点，是我加的）清代的吴兆宜首先提出这里文字有错误，他说：“序云刘氏，此云兰家，未详，或字之讹也。^③”后来纪容舒又疑句有脱失，他说：“兰家女二句，文义不属，‘说有’‘云有’亦复，疑此句下脱失二句，不特字句有讹也。^④”问题的焦点，就在“兰家女”没有正确的解释。因此，后来就有不少人用自己的意见来更改原文，^⑤也有人干脆把这四句删掉的。我个人的意见，这一段文字没有错误，也没有脱落，故无需更改。我们看到《列子》里有这样两处文字：“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又有兰子又能燕戏者闻之”（说符篇）。解释“兰”字的有晋代张湛的《列子注》，他对“兰”字的语源，已不十分清楚，但他的“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谓之兰也”一句，确是指的晋代语言，用来注释这首诗的“兰家女”，确有天造地设之功。“兰家女”犹今人说某某人家的女儿一样。在这一段中，只是虚指，一连六句，描摹媒人怎样从寒暄入手，或言女家，或言男家，并将官府做媒的派头渲染一番，最后接着说“直说太守家”数语，才把此番特来做媒的意思点出。如此虚实照应，成为很好的章法。一般注家忽略了这里一个特殊的词语，就把这一段的意思完全说错了。再上文“寻遣丞请还”一句中的“丞”字，一向解释作“县丞”，我根据上下文义，应说为“府丞”，当时太守遣府丞到兰芝家请婚，并即时回报，就是“请还”二字的意思。看下面几段文字，就分别说明此点。此处不应更牵涉到县丞，以致把文章的脉络阻塞起来。^⑥最近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说这一段诗是太守通过县丞排斥县令，而与刘家联姻等语，这种纠缠不清的说法，对于全诗情节的发展，是没有一点好处的。

现在接着谈“兰”这个特殊词的出现年代，《列子》是晋代人所伪托的书，已是经过证明了的，不容怀疑。如果不把它作为较早期

的作品，而是把它作为晋代的材料来处理，这是不犯时代错误的。在晋代以前，或者以后，我们还没有看到除这诗以外有第二个像这样的“兰”字出现。所以我们说《孔雀东南飞》一诗，也写定于晋代，更确切些说，是东晋年代的产品。

这里顺带的谈一下和“兰家女”对文的“第五郎”，用的也是晋代人熟悉的词语。《世说新语》载“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栖逸篇）。注文称“何准为何充第五弟，于时名德尽称之”。这可作为“第五郎”来源的根据，自然，在这首诗里只是虚指。

二、几个与时代有关的词语

诗中有“卿当日胜贵”一语，一般解释做“你将会一天天富贵起来”，就没有把“胜贵”这个晋代特殊的词语说清。胡三省注《通鉴》说：“江东人士，其名位通显于时者，率谓之佳胜、名胜。”^⑦这是解释“胜”字的，“胜贵”连言，指的也是名位显贵的人，单释作富贵，也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晋书·郗超传》载“风流胜贵，岂不崇敬？”与诗意正合。有时也可倒过来说“贵胜”，《世说新语·政事篇》就有“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的例子。这些都是晋人的特殊词语，通过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它的年代，这对文学的理解，将会深刻、细致得多的。

其次，来谈“诺诺复尔尔”这一句话。注家多以“尔尔”作“如此如此”解，没有从语言的时代来仔细剖解。黄节把“尔尔”解作“应辞也”^⑧，闻一多解作“应声也”，^⑨较为确当，但没有用证据说明，所以后人也很少采用。这里“尔尔”和“诺诺”连文，“诺诺”是用的古语，“尔尔”是晋代通行的口语。“尔”字的声音，据后来《广韵》的记载，有它分化出来的一个“𠙴”字，它的解释和反切是“应声也，人者切”（上声三十五马），与“若”字的上声同音，所以后来又有了变体

的“喏”字^⑩。我们得注意“諾”字和“喏”字虽是同义词，但它们之间是有时代差别的，有些人把它们混同起来是不对的。卢文弨说：“咈字从尔，当读如古诗‘諾諾复尔尔’之尔”。就把“尔”字的声义和字体都说明了。唐代陆德明更作了详细的说明：“唯，应辞，犹咈也。《曲礼》：‘父召无諾，先生召无諾，唯而起。’注云‘应声，唯恭于諾。’正义曰：‘唯，咈也，今人称諾，犹古之称唯，其意急；今之称咈，犹古之称諾，其意缓。’^⑪”这里把它们之间的语言差别说得很清楚，便于我们来理解。接着我们来找时代的关系，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方其时，唯王氏子弟为之，故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即今之喏也。”得此一解，“喏”字是晋代的特殊语言，便毫无疑问了。这里只用了“諾諾复尔尔”五个字，便把府吏说媒成功以后的得意神情和官场的丑态，都描绘出来了。段熙仲教授曾举出了一条《晋书》上用“尔”字的例子，便是很好的说明：河间王顒使人召郅辅来质对毕桓所说张方的反谋，毕桓迎辅说：“张方欲反，人谓卿知之，王若问卿，但言尔尔；不然，必不免祸。”辅入，顒问之，曰：“张方反，卿知之乎？”辅曰：“尔。”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尔。”这是尔尔为应声见于书本的证据。^⑫

晋代还通行过“登时”一语。登时就是即时的意思。诗中有“登即相许和”一句，就是用的当时的语言。我们先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道意篇》载“能令盲者登视，聳者即行”，是把“登”“即”二字分开用的；《自叙篇》载“后有以答之，亦不登时也”。就用了“登时”一语。还有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管辂别传》说：“水火之难，登时之验。”（管辂传）。又《钟离牧传》引《会稽典录》说：“牧遣使慰譬，登即首服。”都是用的魏晋时代的通语。^⑬我们更可由此上推一步，得出“登”字曾经是汉代庐江府一带的方言。汉代桓宽曾做过

庐江府丞，他在自己的著作《盐铁论·相刺篇》中就用过“登得前利，不念后咎”的句子。这可证明“登”字汉代就有了，这与《孔雀东南飞》的发生地点又吻合，也算巧极了。

“不堪”也是晋人的常语，它有“受不了”或“担当不了”的意思。葛洪《抱朴子》里，用了好几个“不堪”和“不能堪之”，它们都是一样的意思。这首诗里，共用了三个“不堪”，如“妾不堪遣使”、“不堪母驱使”、“不堪吏人妇”，语意虽有轻重之别，而含义都是相仿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里，他一共提出了“七不堪”，列举一些自己不能这样做的事情。此后的著作里，就经常看到“不堪”的记载。《世说新语》里用得很多，我们举出一条来，《方正篇》载：“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这里把“堪”和“不堪”对举说明，可以看出当时语言的真实情况。

这首诗里，共用了三个“逼迫”，如“逼迫有阿母”、“逼迫兼弟兄”、“同是被逼迫”。这也是晋人习用的一个词。陆机《谢平原内史表》中，就有“虑有逼迫”的句子。《抱朴子·弭义篇》也说：“夫婚媾之结，义无逼迫。”这和诗的意义，也有关连。其他分用“逼迫”两字的，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如“禹不逼伯成子高”，“近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也可作为与时代有关的例证来看。

此外，与时代有关系的词语，还有一些，我们简略地举出几个来。“堂上启阿母”的“启”字，本是公文启白的专称，晋人的书里，借用作禀告。陈寿《三国志·太史慈传》，有“事毕，还启其母”的话，和诗的用法正同。又“作计何不量”、“作计乃尔立”两句中的“作计”二字，也是晋代语言，《世说新语·雅量篇》“我本不为卿作计”，又“当作何计”，均是。又“处分适兄意”里的“处分”二字，是处置的意思，也见《世说新语·尤悔篇》和《识鉴篇》，我们就不再列举了。

再有就是“儿今日冥冥”一句的解释，闻一多《乐府诗笺》说：“日冥冥，日暮也。”课本的注释就引申其义，说成“这里拿太阳下山来比生命的终结”。把“日”字连下来解释，我看与原诗的意义是不符合的。这里“冥冥”应当指意志昏沉，不当连上“日”字作解。《抱朴子·怯惑篇》载：“有仙人来迎我，共乘龙而升天，良久，低头视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绝远。”诗里“冥冥”，正是“杳杳冥冥”的意思，解释为昏昏沉沉，是与上下文义统一的。

三、几个被错误掩盖了原义和时代关系的词

在这首诗里，还有一些词语，一时看不出时代关系来，但进一步加以研究，从校勘和训诂的关系上，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几个长远被错误掩盖了原义的词语，也就是要把它们还原过来，才能从中看出它们的时代关系。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例子。

第一个谈“承籍”的校勘问题。诗中有“承籍有宦官”一句，黄节说：“籍，户籍也。承籍有宦官，言继承先人户籍，世有宦学宦官之人也。^⑩”这个解释是否正确呢？我们要参考其他的证据才能决定。《世说新语》里有三个例子，《雅量篇》说：“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又《政事篇》说：“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和静致治。’”又《识鉴篇》说：“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剋。”这里用的是日本影印本，三处都作“承藉”，我们仔细研究上下文义，把它作为继承先人户籍讲是不通的，“承藉”应该解做继承凭藉的意思。上文王东亭是继承凭藉桓宣武，王长史是继承凭藉山遐，都不是继承先人的户籍。所以，诗里用的“承籍”，是“承藉”的误文。承藉是晋代的语言，用得相当广泛，如《文选》载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说：“公孙渊承籍父兄，世居东裔。”《晋书·武十三王传》有“桓玄承籍门资，素有豪

气”。原文和诗一样，都把“藉”字写错了，所以在文义上讲不通。我们研究汉语史的，先得通过校勘把它时代关系找出来，同时使这个久已掩盖了原义的词，还出它的本来面目。

其次，要谈诗中“恨恨那可论”一句中的“恨恨”这个词。这句话是写的仲卿和兰芝分道还家时的情形，一般注家都把“恨恨”作为“愤恨到极点”来解释的。我们从其他人说别离的文章里，知道这个词说愤恨是有问题的。我们还得先从校勘入手，假定“恨恨”是“恨恨”的错误，而把“恨恨”的时代意义找出来。三国魏张揖的《广雅·释训》：“恨恨，悲也。”这是较早的训释。陈寿《三国志·法正传》说：“顾念宿遇，瞻望恨恨。”此后晋人的文章里用的很多。《文选》里至少见过三次，而文字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陆机《谢平原内史表》说：“所以临难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恨恨，如何可言？”李陵《与苏武诗》虽是伪作，但不会晚于晋代，也有“徘徊蹊路侧，恨恨不得辞”的句子。这里举的例子，都可以说明“恨恨”是一种惆怅悲痛的意思。后来的人对这个魏晋人的语言，知道的不多了，所以往往把它写作“恨恨”二字，这有唐代李善和五臣的《文选》注本可作佐证。胡克家的《文选考异》里说：“《谢平原内史表》，恨恨，何校作恨恨；袁本云：善作恨恨，五臣作恨恨。案各本所见皆传写误也。《与苏武诗》，二本校语，五臣作恨恨，善作恨恨，与此全属相反，彼是此非。”我们知道，《文选考异》一书是校勘学家顾广圻代作的，他的校语，一向是被认为正确可信的；同时，李善是熟悉魏晋的时代语言的，他曾向曹宪问过学，而曹宪就是撰《博雅音》^⑩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李善对《广雅》中“恨恨”一词的解释，是知道的，所以不会弄错；相反，五臣的学问浅陋，所以好几处都把“恨恨”写错了。准此，这首诗的错误，也出于后人所改无疑了。校正了这个错字，时代意义也就明确了，被掩盖了原